

# 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观探赜

吴焱盛, 陈云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环境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对自然的观点和理解具有可比较性。一是在同构契合层面,两者都采用了联系与统一的哲学分析方法,展现了批判与创新的辩证精神,以及共同追求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目标。二是在异质分歧层面,无论是基于“泛主体论”的有机哲学,还是基于“人化自然”的唯物史观,各自都批判了“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展示了“田园牧歌”的后现代图景和“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文明。通过整体分析二者关于自然的同构契合与异质分歧,对于构建“全球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生态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启示

**中图分类号:**X2;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5-0001-10

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是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支理论劲旅,最早由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提出并建构,主要代表人物有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和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等。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面造诣颇深,但带有明显的“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特质,这导致在自然观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天然的理论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

迄今为止,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根据现有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陈喜荣<sup>[1]</sup>认为生态女权主义又名生态后现代主义,他将两者作为同一理论进行研究,而杨通进<sup>[2]</sup>则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具有“生态后现代主义倾向”,但不能等同论之。黄丹麾<sup>[3]</sup>、肖西西<sup>[4]</sup>、张可菲<sup>[5]</sup>从文学艺术视角出发,对美术、小说、散文进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解读,反映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抵触情绪、对未来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真实”关系的精神追求。

汪霞<sup>[6]</sup>、温恒福<sup>[7]</sup>等考察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并思考其对中国教育改革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而史晓朦<sup>[8]</sup>、丁通通<sup>[9]</sup>则主要围绕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思想展开研究。无疑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其生态思维,它形成了一套所谓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于文秀<sup>[10]</sup>、王素娟<sup>[11]</sup>深入分析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指出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生态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生态后现代主义相关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冯石岗等<sup>[12-13]</sup>比较分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契合点,并进一步从哲学角度对比了怀特海相关性原理与马克思联系观点。张莹<sup>[14]</sup>、王南湜<sup>[15]</sup>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与怀特海两人在自然观上的差别,为马克思与怀特海思想的结合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可能性。同时,王雨辰<sup>[16]</sup>、于爽<sup>[17]</sup>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中国和世界重构新的生态文明具有重要价值。虽然以上研究鲜有直接系统对比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容,但不乏为后继者

收稿日期:2022-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研究”(18CKS033);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22年决策咨询重大项目“永泰山区生态富民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022JCZX003)

作者简介:吴焱盛(1998-),男,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陈云(1985-),男,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理论。E-mail:384234881@qq.com

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方法。显然,不同的理论有其相同之处、亦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倾向。在全球化布局不断深入的现代社会中,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思想的交融无疑为理论与实践的进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性思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同思想的碰撞、结合与对比有助于我们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拓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论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为进一步探寻自然万物共生之道注入新的势能,增添新的活力。

## 一、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同构契合

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对人类文明有各自深刻的见解,体现了鲜明的生态底色,回应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并积极将理论应用于现实之中。虽然两者的哲学流派不同,产生背景不同,理论侧重不同,但对自然的看法上存在诸多契合。

### 1. 联系与统一的哲学分析方法

所谓联系与统一的哲学分析方法,是指运用联系观点和整体视角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事物间的关系。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普遍相关性与“共同体”思想无不透露着其联系与统一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遵循唯物辩证法分析范式,包含了“世界是整体发展”和普遍联系的辩证观点。就此而言,不论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的自然观都包含了联系与统一的哲学分析方法,体现了一定的同构契合性。

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主张一种彻底的非二元论思想,旨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彻底的非二元论之所以“彻底”,在于它比二元论走得更远,认为“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sup>[18]</sup>。正是世间万物的普遍联系构成了复杂多变的世界,而千变万化的世界统一于整体之中。一方面,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可能是毫无联系的“孤岛”,现实实有的存在物在“过程”中与其他事物始终保持某种相关性。具体而言,身体与心灵、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地方的关系,乃至宇宙间众多的现实存在都具有内在关联性,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自然事物与自然事物

之间的联系也是普遍存在的。任何现实事物都不能独善其身,孤立存在、除了自身内部的联系之外,必然在一个整体的空间下始终与除自身之外的世界联系。每个经验生成的现实实有,作为永恒客体的存在而流变发展,在不断摄入经验的过程中与其他现实实有不断产生复杂的联系,所以“联系是一切事物的本质”<sup>[19]10</sup>。任何一个个体或共同体都具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有自身或者共同体的目的和利益,只有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诸多个体才能结成共同体,这种普遍相关性的联系观点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从强调个体内在价值到关注整体(共同体)价值的转向。另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统一性分析方法基于过程哲学整体论思想,隐含“泛主体论”和“泛灵论”的倾向,认为一切现实实有的东西都是主体,一切原初之物都可称之为有机体。当然,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不仅表达了对个体的关切,更表现了对有机统一体的重视。人与自然耦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突显了宇宙整体论思想,自然万物都是宇宙过程的一个环节,是宇宙共同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宇宙中不存在纯粹独立自主的事物,“芸芸众生的聚散和兴衰只是宇宙亿万年历程中短暂而匆匆的一道弧光而已”<sup>[20]233</sup>。具体的事物不过在地球发展进程中表现为昙花一现,两者都统一于地球或者宇宙共同体之中。由此而言,人与自然则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

同样,联系与统一的哲学分析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中。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两者绝非孤立、对立的二分关系,主客体之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分析来看,他将人与自然理解为“对象性存在”的范畴,任何存在物都表现为他物的对象,“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sup>[21]210</sup>。在对象性活动中,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sup>[22]167</sup>的主体。客体则表现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即人类活动的承担者。人的主体性通过与自然(客体)的交往活动得以体现,而人又同动物一样受到自然的制约或限制。换言之,作为主体的人具有主观意识,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影响自然界的历史进程,作为客体的自然同样能够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

或消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sup>[21]209</sup>,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sup>[21]161</sup>等人与自然联系统一的观点。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sup>[6]323</sup>。显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统一的整体,打破了以往自然观中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创造性地将“对象性活动”引入认识论,架起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桥梁。

## 2. 批判与创新的辩证精神

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来都是在当破当立的循环往复中曲折发展的,“破”并非文明进步的终极目标,对旧事物的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或解构一切,而是期望、构想、迎接一个崭新的世界。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不同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它并非破而不立,也非“立”而无用,而是注重一种建设性的辩证精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蕴含伟大的否定精神和创新意识,在肯定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批判其隐含的生态环境风险。就此而言,无论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都体现了批判与创新的辩证精神。

生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说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支理论劲旅,根本在于它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根据”<sup>[20]86</sup>。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批判现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掠夺和漠视,控诉现代人经济至上的观念,对工业社会的冷漠无情和机械运转表达极大的不满。但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认现代社会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而是试图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找“治病良方”,创新性地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方案。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的断裂”<sup>[24]194-195</sup>。格里芬指出,生态后现代主义要“坚持现代性最好的方面而拒绝其消极和负面的方面”<sup>[25]</sup>。此外,中国学者王治河在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时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sup>[26]</sup>。事实上,“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双重规范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思考方

式。相对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或者“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中的破而不立,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中的“立”而无用,生态后现代主义则显得相对温和,它不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进行完全否定,而是对解构主义大潮打破的各类社会元素进行整合重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并以生态环境为视野,尝试“感化”世人,建构后现代的生态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城市等。

同样,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蕴含辩证否定的科学精神。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非生态”的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生态文明的共产主义。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对先前文明的否定性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打通了世界的“经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人对自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隐患。尤其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对“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sup>[27]36</sup>。在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创新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27]43</sup>。“生态性”始终贯穿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影响。简言之,在抨击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建构了自然的、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体现了对以往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自然观在内的辩证否定态度。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自然观“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sup>[28]279</sup>。再批判费尔巴哈把实践从人与自然的客观关系排除出去,造成了人学的空场,认为人与自然只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忽略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所以在社会历史观上容易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并非凭空产生或者一蹴而就,而是在批判与创新的科学

精神中发展着。

### 3. 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旨向

在生态文明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旨向的共同愿景,和谐与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基本目标之一。生态后现代主义谋求“共同福祉”的后现代生态文明,针对现代性各种问题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极大威胁,指出人类再不“悬崖勒马”,将自食生态破坏之恶果。同样,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持一种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点,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才能提供人与自然和谐的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才可以说是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愿景基于后现代的世界观,这种后现代生态文明世界观强调“和谐与协同”<sup>[29]</sup>。世间万物具备主体和客体的双重价值,“我们应该同我们的总体环境保持某种和谐”<sup>[30]22</sup>。根据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内在联系特性,事物之间的经验变化过程与其他事物时刻发生着联系,一个实体遭受破坏必将影响整体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事物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单位而言,自然价值的实现必然表现为人的价值的实现。自然遭受破坏,人作为共同体的个体单位而言,人类生活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人类试图以现代思维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平衡就出现了“断裂”,这种现代性思维难以说是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思维。因此,事物之间的和谐是发展的前提。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通过“返魅”的科学,恢复人的自然性,引入宗教神学,试图描绘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方面的和谐发展图景,进而提出“关爱他者”和“在邻人”或“在家园”的和谐思想。这种和谐思想集中表现为:人在地球上诗意的栖居。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够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sup>[30]38</sup>,正是这种和谐的、诗意的栖居共生关系才能够消除现代人独断专行、藐视自然的傲气,真正领悟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精妙所在。因此,和谐也是发展的归宿。和谐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后现代生态文明的愿景中,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呈现出一幅整体内部动态平衡的和谐景象。

同样,和谐与发展的生态文明愿景内蕴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愿景的题中之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sup>[21]161</sup>。人和动物一样,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必然要与自然界进行某种物质交换活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是有意识地改造无机界(自然界),以此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进而寻求自身更大的发展。当然,如果人类将自身意志强加于自然界,不加节制地、违反规律地改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将无从谈起。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23]559-560</sup>。当人类自以为可以用知识力量统治自然界的时候,和谐发展就已经深陷危机,殊不知认识水平的提高不过是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然界,更好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动态平衡发展的条件,而非主宰自然。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sup>[23]560</sup>。转言之,只有当人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之时,人与自然才有和谐发展可言。

## 二、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异质分歧

经过理论比较,不难看出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具有一定的同构契合点,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也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共识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当然,细究而言,两者的理论毕竟源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在自然观的分析上“殊途”但并不“同归”,存在着必然的异质分歧,厘清这些分歧对于整体上辩证把握两种思想的自然观具有深远意义。

### 1. 基于“泛主体论”的有机哲学与“人化自然”的唯物史观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都从宏观上讲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但毕竟不同的哲学基质必然产生不同的哲学取向。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对待世间万物的态度具有过程哲学“泛主体论”的倾向,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明确站在人是历史发展主体的唯物史观立场上,以“人化自然”的学理阐释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

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泛主体论”与有机哲学基础是分不开的,且“泛主体论”与“泛经验论”“泛灵论”的关系无法割裂,容易坠入神秘主义的深渊。生态后现代主义彻底的二元论批判了主体与客体二分对立的观点,质疑所有本体论或实在论上的实体观,很难看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充满了泛主体论的思想。在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自然观看来,主体可以视为“永恒客体”,“永恒客体”则表现为主体的内容,“除主体的经验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纯粹是无”<sup>[31]215</sup>。整个宇宙统一表现为动态生成的经验过程和主体发挥创造性的过程。具体来看,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泛主体论主要表现在它将人降格到和其他生物一样,人和其他自然物乃至非生命的存在都是宇宙整体中的“经验事件”,整个世界不过是经验生成的过程,由此,“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sup>[32]</sup>,这些主体是具有经验的现实实有或“经验事件”。可以说,对于所有的个体同时也是主体而言,不区分感官,都具有经验感受性。正是现实实在之物具有感受性,才能够不断摄入经验,并不断体现出自身的创造性。现实的物质是经验的物质,实在就是经验的过程,经验的过程就是实在,所以说“物质乃是某种类似于我们自己的经验的东西的外在现象”<sup>[33]227</sup>。毋庸讳言,泛经验论实质上具有泛灵论的色彩,泛灵论引导了过程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体现在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者将“上帝”请入理论分析的方法上,尽管在世俗社会里人们“常常避免使用‘上帝’一词,常用‘神圣’或‘神秘’来取代”<sup>[34]39</sup>,但却避免不了上帝观念的潜在影响,世间之物作为上帝的共同造物,不外乎是具有神性的。泛灵论最基本的观点则是“万物有

灵”,在万物皆是经验主体的基础上,赋予存在以某种神性,来进一步佐证“自然界乃是神的最本质的显现”<sup>[30]65</sup>这一说法。那么,“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sup>[30]210</sup>的主体。同为受造物的人与自然成为平等共生的有机整体,(抛开内在价值而言)一切自然之物都应被视为与人同等的主体。

然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这一问题上,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明显表现出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表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质,而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应的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主体与客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核心叙事是关于“人化自然”的观点,它强调了自然与历史的同一性。自然具有历史性,历史同样具有自然性。“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自然和历史看似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实际上是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范畴,自然属于实体范畴,而历史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活动,历史在人与自然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发展。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历史特定阶段的体现,是自然的人化特征,“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sup>[21]528</sup>。脱离历史空谈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费尔巴哈等人的“半截子唯物主义”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同样,脱离自然来谈历史也毫无意义,如果把从自然中分离,自然就成了“自在自然”或纯粹的自然。自然的历史不可能没有人类的参与,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人类通过劳动建设自己的家园,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历史。实际上,客观自然界进入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成为了人类思考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把人与自然视作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失去其中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sup>[21]220</sup>。人类实践活动影响自然的同时,也是自然在自我调和的发展过程,人靠自然界得以繁衍生息,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sup>[21]161</sup>,人的肉体和精神离不开自然,人类当前的生活环境不仅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也包括实践活动产物在内的实践活动本身,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

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

## 2. 批判“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看待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上,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都进行了深入考究,尽管在结果的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究其根源却大相径庭。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认为导致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四伏的原因是“现代性”,针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方式进行思辨性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则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生态后现代主义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现代性”的批判,其致力解决的根本课题是“现代性及其西方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问题”<sup>[18]</sup>。现代性是一个抽象词汇,是指“现代世界观”及其后果的“现代境况”<sup>[20]1</sup>,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方式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立的生产关系,即把自然当作物质,当作没有内在价值的资源,看作人类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将人的身体看成一架独立的、不具备情感的生物机器,且“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sup>[3]2</sup>,这样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根本不会在意人与自然的联系,根本不会顾及自然的好坏变化。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决裂了,人把自然拒之千里,将自身置于不断重复的、独立的机械生产活动之中。不得不提的是,现代性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包括了个人主义、经济主义、科技主义、民族主义、极度男性等现代境况,这些都是二元对立思维主导的现代境况。那么,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所批判的现代性生产方式,其实就是批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生产关系上呈现出机械生产的现象,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始终以现代性为噱头,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生产方式,极力回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讨论,这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了较大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深挖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资本家(有产阶级)掌控着社会生产资料,而私有制规定了生产资料不可能为工人(无产阶级)占有,失去土地的

农民和工人逐渐沦为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人和人的劳动必然走向异化,“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sup>[21]155</sup>,“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sup>[21]51</sup>。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被国民经济学以抽象的规律和公式掩盖了,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sup>[21]155</sup>。实际上,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如何通过劳动异化产生出来的,因为从一开始国民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资本家的私人利益。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的长期发展,其他阶级的区别逐渐消失了,整个社会必然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两大对立阵营。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过程,同样也暗藏危机。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即节约成本不惜牺牲工人的寿命和自然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sup>[36]491</sup>。工人劳动的前提是在资本家预设的环境中进行的,资本主义大肆压迫工人劳动,也就是压迫自然。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考虑“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sup>[21]158</sup>。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的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已经建构了自然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

## 3. 走向“田园牧歌”的后现代与“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文明

在规划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上,生态文明都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共同话题。但是,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主张稳态经济来达到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态文明,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则注重以人为本的现代经济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文明。

由于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对身体、自然和地方的关注,引发对生物圈共同体的推崇和地方共同体的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后现代生态文明趋向于一种“在家园”农庄生活,提倡“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稳态(静态)经济学。如前文提到的,在家园感是后

现代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重要特征,“我们感知的是一个由下述环节连接而成的不间断的连续体: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圈/社区/邻里/家庭/个人……,认识到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地球共同体派生出来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式”<sup>[20]185</sup>。整个地球就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场和根据,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小到家庭共同体大到宇宙共同体,任一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正因如此,物种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才建立了“亲缘”关系。因而作为有意识的人应该“返璞归真”到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活,“回到比较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sup>[24]236</sup>,在地球家园上诗意的栖居和创意的存在。进一步而言,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中的农庄生活所采用的经济范式就是稳态经济,稳态经济方案是赫尔曼·达利(Herman E. Daly)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方案。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产生的现代性危机已经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威胁,“即使是世界上现有的最好技术也无法保证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sup>[37]6-7</sup>。“只有全球经济范式的转变,才有可能使国家、文化、文明以我们迄今为止所知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sup>[24]6</sup>。“稳态意味着恒定的物质财富(资本)系统和恒定的人(人口)的系统”<sup>[38]37</sup>,稳态经济则意味着人口与财富之间维持稳定的状态。虽然达利明确表示稳态经济针对的是“增长”型的现代经济,强调“这种稳态绝对不是静止”<sup>[37]44</sup>,但依然不能消除其反对经济大发展的嫌疑和唱衰科技发展的论调。显然,田园牧歌式的后现代生态文明难以服众,生态后现代主义自然观走向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存在一定出入。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的憧憬基于唯物史观,基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两个和解”思想,“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sup>[21]63</sup>,“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统一于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只有完成“两个和解”,才能达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具有共时性,“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sup>[21]534</sup>,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文明世界里,这些狭隘的关系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将和谐、

自由的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但并不是回到“诗意的”的农庄生活。未来的共产主义生态文明将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21]185</sup>,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39]466</sup>。毋庸置疑,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文明必然包含了人和自然的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活动高度活跃等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人自身解放的前提,而要使人达到全面发展则离不开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未来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经济和科学作为生产力而言,也可以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来适应人类发展的需求。为此,恩格斯指出,“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sup>[21]77</sup>。同时,人作为生产力而言,人口的增长无疑创造了更大的生产力,科学亦是如此,“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sup>[21]82</sup>。

### 三、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比较的生态启示

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危机已经给人类敲响警钟,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已经成为全人类亟待探讨的问题。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所引申的各类生态环境理论层出不穷,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学术背景、文化背景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案。紧跟时代前沿,立足当代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汲取国外生态自然思想的菁华,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剖析、比较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观及其意涵,对推进全球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 1. 自然万物的“生生相息”与“全球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观比较的同构契合层面来看,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自然万物之间都体现了联系与统一的整体性,即自然万物之间生生相息、生生与共。尽管说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它们关于自然观的某些契合性阐述也可能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而做出特定的表达,



但是两者所隐含的生生相息、万物一体思想却形成了共同的理论旨趣。那么,全人类的关系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发展的,自万物的生生相息影射了人与人之间命运与共的关系,人类生活在地球“大家庭”中,人类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恩格斯早已断言人类一味地征服自然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sup>[23]560</sup>,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全人类的命运也是共同体,一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那么自然将报复的是整个人类,人类文明必将承受巨大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sup>[40]374</sup>。自然万物的兴衰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观的联系与统一所表达的自然万物生生相息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推动构建全球化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寻求全球层面的生态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关乎人类当前的生活质量,更关乎人类千秋万代的发展大计,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寻求全球化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要动力。当前,人类面临空气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等残酷现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频发,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警告”。然而,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生态帝国主义及其生态霸权思想更是加重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全球化生态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受到阻力。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紧张局势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致力于探索“节能减排”的全球生态合作道路,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拒签《京都议定书》,随后加拿大也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他们的理由虽各有不同,但却有一点可以肯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必将损害其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发达国家,排放二氧化碳的全球占比远远高于人口数量的全球占比,却希望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承担相应的节能减排义务,其生态霸权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也难怪克莱顿指出“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sup>[24]219</sup>。同时,美国还于2019年退出了《巴黎协定》,且至今未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此外,尽

管只占世界人口的少数部分,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地球上开采的和掠夺别国的资源却并不少,美国和西欧等国家近年来对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对外扩张时期的殖民掠夺,如今更体现在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霸权思想上,他们向亚非拉等国家大量进口石油、铜、铅、锌等金属矿产,并炮制所谓的“对外援助”方案掠夺外国资源。毋庸置疑,自然万物的生生相息和生生与共正在遭受严重的挑战,生态霸权思想的崛起使得推进全球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必要。“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sup>[40]434</sup>,全人类应该是“地球村”上相亲相爱的共同体,而不是尔虞我诈的对立体。因此,遵循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荣的规律,才能推动构建生态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2. 自然万物的“和而不同”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观比较的异质分歧层面来看,体现了自然万物“和而不同”的差异性问题,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人与自然是否都具有内在价值?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谁是主体性推动力量?生态环境保护究竟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这些问题的解答实质上就是追问如何在自然万物生生相息、和合共生中审视其和而不同的差异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正是站在整体性思维的角度上看待差异性的具体世界,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21]196</sup>,自然界将会有怎样的面貌取决于人如何进行实践劳动,表明了人有意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提供动力源泉,人作为主体力量对环境保护和自身全面发展承担主体责任。因此,自然万物虽千变万化、不尽相同,但人与自然的应始终保持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一言以蔽之,从自然万物和而不同的差异性问题出发,如何从中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固然需要坚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进行理性推敲。

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克服人与自然和而不同的差异性,也要推动实现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并进的目标,换言之,以人为



本的可持续发展要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又要注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建设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协同并进的生态文明。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却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产生了些许矛盾,创造性的、诗意的生活难免有反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之嫌,这样的后现代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逆流”,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作用,难免陷入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泥潭。同时,后现代生态文明蕴含浓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气息,抑或说充满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论调,试图把自然拔高到人的高度,这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显然,基于“田园牧歌”式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所擘画的“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生态文明在实践推进和最终目标是存在差异的。如果人类返回农庄生活,将人与自然万物摆在同等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成了空中楼阁。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要依靠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实践水平,又要做到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绝非否认自然客体的内在价值和基本权利,更不等于说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统治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36]</sup>,无论人类生产力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始终要受到自然界的牵制。因此,无论人与自然主体最高论之争进行到何种地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争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人都是永恒的课题。当然,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有现代化的工业支撑,更要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制生产方式,而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并不能抑制经济发展,限制科学技术进步,而应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度,进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27]53</sup>。事实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sup>[21]187</sup>,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完成了自然的解放。可以说,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与自然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推进要始终保持理性的头脑,充分认识自然万

物的生生相息与和而不同,以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待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全球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喜荣.生态女权主义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5):522-526.
- [2] 杨通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J].广东社会科学,2003(4):117-123.
- [3] 黄丹麾.生态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美术[J].美术观察,2002(12):59.
- [4] 肖西西.回归“真实”——对《我的安东妮亚》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解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2):91-95,100.
- [5] 张可菲.《在果园里》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特征[J].英语广场,2021(20):58-61.
- [6] 汪霞.从生态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理解课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9):41-45.
- [7] 温恒福.建设性后现代教育论[J].教育研究,2012,33(12):23-28.
- [8] 史晓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观对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启示[D].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14.
- [9] 丁通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教育思想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 [10] 于文秀.生态后现代主义: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J].学术月刊,2007(6):16-24.
- [11] 王素娟.试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观点[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0(1):73-75.
- [12] 冯石岗,王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问[J].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3):69-73.
- [13] 冯石岗,张丽,陈宇洁.怀特海相关性原理与马克思联系观点的异同探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7(6):98-100.
- [14] 张莹.怀特海的“摄入”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6(21):137-138.
- [15] 王南湜.马克思与怀特海自然观的异同及其意蕴[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2):37-47,254.
- [16]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J].哲学动态,2016(1):44-51.
- [17] 于爽.两种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对照及启示——基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5(4):34-38.
- [18] C.斯普瑞特奈克,张妮妮.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7(6):57-62.

- [19] 怀特海. 思维方式[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6.
- [20]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 张妮妮,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 孟献丽, 等,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5] 大卫·格里芬, 王俊锋, 周邦宪.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三十年[J]. 哲学探索, 2021(1): 1-16.
- [26] 王治河.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1): 25-35.
- [2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9] 于文秀. 生态后现代主义: 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J]. 学术月刊, 2007(6): 16-24.
- [30]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 [31]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 宇宙论研究[M]. 杨富斌,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32] 王治河. 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 50-56.
- [33] 大卫·格里芬. 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M]. 鲍世斌,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2.
- [34] 小约翰·柯布. 柯布自传[M]. 周邦宪, 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 [35] 王治河. 别一种后现代主义[J]. 求是学刊, 1996(4): 16-20.
- [3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7] 赫尔曼·达利. 超越增长: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 诸大建, 胡圣,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38] 赫尔曼·达利, 肯尼思·汤森. 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 马杰,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01.
- [3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Views of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and Marxism

WU Yi-sheng, CHEN Yu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and Marxism occupy an influential position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ircles, and their views on nature are certainly comparable. On the level of isomorphism and mutual fit, both of them, adopting 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ethod of connection and unity, have the dialectical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and share the common goa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level of heterogeneity and divergence, they are based on the organic philosophy “pansubjectivism” or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humanized nature” respectively to criticize the modern production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or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expect to achieve the postmodernity of “idyllic pastoral” 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double libe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n integral analysis of the isomorphic mutual fit and heterogenous divergence of their ideas would be a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he human-orien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a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which humans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Key words:**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Marxism; nature view;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编辑 王思齐】